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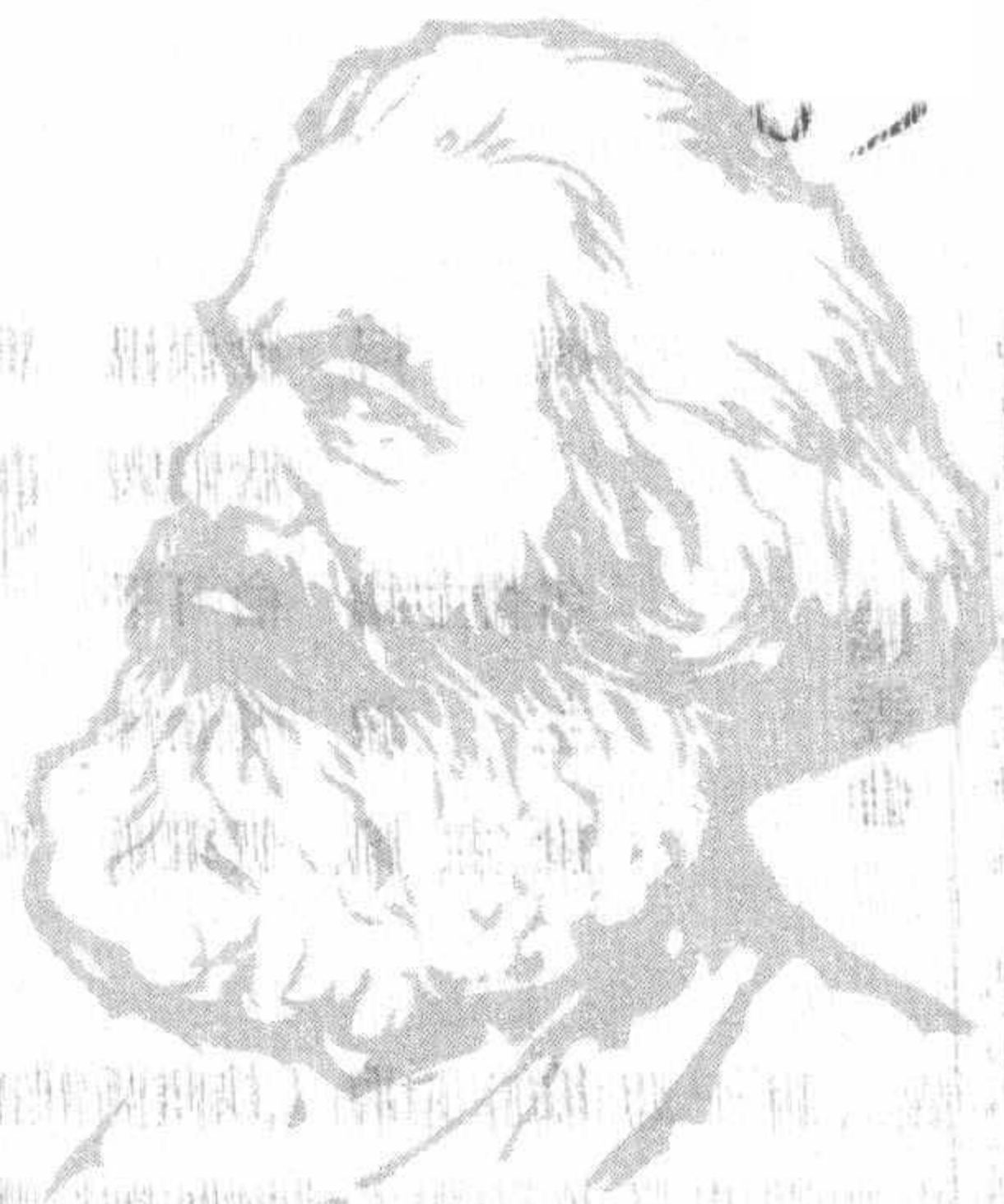


大同世界

Commonwealth

[美] 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 著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王行坤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Karl Marx

大同世界

Commonwealth

[美] 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 著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王行坤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同世界 / (美) 迈克尔·哈特,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著; 王行坤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08-3

I. ①大… II. ①迈…②安…③王… III. ①全球化-研究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C913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2793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大同世界

[美] 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著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王行坤 译

Datong Shij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0.2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5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題。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帝国时代的“大同书”

——《大同世界》代译序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是哈特与奈格里“帝国三部曲”^[1]的最后一部。奈格里与哈特亦师亦友，更是本书所提倡的共同研究者（co-researcher）。两人的合作^[2]可以追溯至1994年，在共同合作的《狄俄尼索斯的劳动》^[3]中就从劳动的角度展开了对“国家形式”的批判。而本书也并非两人合作的终结，在全球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从“阿拉伯之春”到各种各样的“占领”运动）之后，两位学者于2012年出版了名为《宣言》的小册子^[4]，来探讨这些运动所昭示的反抗和民主的可能。相信他们的合作还会继续下去。

译名与“大同”思想史

首先来说说本书的译名。原书序言即“序言：诸众生成一君主”（Preface: The Becoming-Prince of the Multitude）中所加译者注大概解释了这个译名，这里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做一说明。将“Commonwealth”翻译成“大同世界”，肯定会让中国读者想到《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如果我们“从古代来理解古代”的话，所谓公天下或者官天下，是与家天下相对应的，主要是从政治道德角度来约束君主，提醒人君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忘了公平和公正。^[5]正如《礼记正义》所解释的那样：“‘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这与“父传位于子”的“家天下”，判然对立。^[6]于此，君主只是暂时承负着大公无私的“天命”，从君权转移的角度来看，就有了“禅让”和“革命”的观念：前者是认识到气数已尽之后，主动将君权转交给有德者；后者则是在失却“天”的眷顾后，被另一个获得“天命”的君主所强行取代。毋庸置疑，以禅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天下为公”观念，与我们（以及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大相径庭。

时至清季民初，在进步观念、社会主义，尤其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传统佛学的冲击下，“天下为公”经由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再阐释，“大同”便具有了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国际主义的内涵。诸如康氏在其《礼运注》中，便把“天下为公”解释为“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把“讲信修睦”解释为“国之与国际，人之与人交，皆平等自立，不相侵犯”。其曰：



夫人类不平，则教化不均。风俗不美，则人种不良。此为莫大之害。……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畜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慈幼、恤贫、医疾。^[7]

更重要的是，在“孔子改制”之说的绳墨下，“天下为公”指涉的不再是上古之世，而成为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与现代社会理论勾连了起来，给后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曾有如下评论：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

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8]

可见毛泽东也认同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但与康有为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向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过渡，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在他那里，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不断过渡、不断革命的进程。那么，这种大同世界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哪怕非常微弱的出场呢？

在沟口雄三看来，中国有着日本所缺乏的财产公有的传统。人民公社是将宗族的财产共有制度的规模扩大到了全体人民。^[9]这里的宗族的财产共有制度可追溯至宋代的族田义庄制度，是全族成员可以共享的财富。沟口的比附或有一定道理，但须知这种共享制度具有强烈的封建性与宗法性，其济世效果也非常有限，与人民公社是两种事物。

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以“五斗米道”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带有原始社会主义的性质，与人民公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并且动员干部们阅读《张鲁传》，古为今用。^[10]饶是如此，这种原始社会主义也只是财产上的社会主义，而非生产上的社会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言，张鲁的政教合一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而儒家经典所记载的井田制或许有生产性共同体的性质，这也许构成了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关联，但其终归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和国野、乡遂制度之上，远非什么平等社会的产物。后来的限田制和均田制等土地制度可以说是井田想象的某种回响，体现了以平均为特征的公平思想。而这种思想也体现在秦汉尤其是唐代“两税法”以来的旧式农民战争中：小农式的平均分配。

由此看来，共同性（the common）的幽灵除了存在于族田义庄，也存在于张鲁政教合一的财产共同体（在侯外庐看来，中唐以前因为剥削特别残酷，农民战争有着“财产公有”的狂暴的幻想或向往所谓“太平世界”，而在中唐以后因为剥削的稍微缓和，农民则提出现实的等级平等和财富平均的要求^[11]）和儒家的井田想象以及后世的限田均田举措之中。在沟口雄三看来，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有着内在关联的，这个关联就是中国“公”的观念。倘若取近代思想家对“大同”作出的新解，那么将书名翻译为“大同世界”是符合原作者本意（就是共产主义）和我们的文化想象的。

共同性与对抗的力量

下面说说共同性这个概念。一般将“the common”翻译为“公地、公共资源或公共事务”，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河流和空气等。这也是近代欧洲思想史中的一个问题域：在近代的占有式个人主义崛起之前，欧洲思想也存在共同性或共享的观念。正如洛克所指出的：**虽然自然的东​​西是给人共有的，然而人既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动或劳动的所有者，本身就还具有财产的基本基础。**当发明和技能提供了改善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的时候，人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或享受的大部分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并不与他人共有。**^[12]也就是说，经过劳动的中介，财产权和私有权得以确立。因此，哈特和奈格里指出，从洛克到黑格尔，在欧洲政治思想的主导观念中，人们占有事物的绝对权利，成为法律规定下自由个体的基础和实质目的。

另外一个研究共同性的作者莱恩堡（Peter Linebaugh）指出，我们一般只知道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而很少有人听过1217年的《林业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虽然在当时的英国，二者是并列的）。^[13]前者（其核心在于保护私有产权和财产）成为现代的根本法并广为人知，而后者（其核心在于保护所有自由人共享自然资源的权利）逐渐成为历史遗迹，这个症候式的现象也证明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论断：现代的共和国——无论是美国还是法国——根本说来就是财产共和国，施行的是财治（rule of property）。

另一方面，这些公共资源受制于稀缺性逻辑，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管理，将会导致“公地悲剧”。大卫·哈维在对本书的评论中指出哈特和奈格里没有处理“公地悲剧”问题。^[14]我在初读此书的时候也很疑惑他们为何没有提及《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为此，我曾写邮件向哈特教授请教，他也承认奥斯特罗姆的这本书对他们的讨论有所补益，但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在思考其他作品和作家，并没有将这本书纳入考量。

或许两位作者看重的是另外一种共同资源，那就是因为非物质劳动而生产出的如知识、语言、符码、信息、感受等，这些非物质产品不再受制于稀缺性的逻辑，相反，在流通过程中这些产品反而会得到强化和衍生。观念传播得越广，受众越多，就说明这种观念越具有生命力。这是在生命政治生产霸权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同资源，在实践上可以为所有人所共

享，取之不尽，用之弥多。因此，我将“the common”翻译为“共同性”，同时涵盖自然资源和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抽象（人工）的共同资源。

正是通过生命政治生产及人工共同性，两位作者窥见了共产主义的曙光。那么，什么是生命政治生产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简要考察下“三部曲”的前两部。

事实上，这三部作品的内容既有所推进又相互交叉：《帝国》已经预告了诸众的历史性出场，《诸众》不过是对这一新历史主体的进一步阐释；《诸众》也提及了共同性的划时代意义，而《大同世界》也是对这一主题的深度阐发。在《帝国》中，两位作者借用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对罗马混合政体的论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世界所出现的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帝国，这是不同于帝国主义和古代帝国的新帝国：以美国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其他发达国家和跨国财团所代表的贵族制，以及由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民主制。正是这三个层级构成了新的帝国秩序。

在这种帝国体制下，原本作为历史主体的产业无产阶级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去技术化的、异质性的作为奇异性的诸众。诸众对抗帝国，这就是前两部作品的主题。

对抗的力量源于何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危机理论一般都是基于客观因素，如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趋势、消费不足论、不平衡发展问题或生产过剩问题等，而对主体维度的关注有所欠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诸众对抗帝国的主体性力量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是一种内在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源于生命政治生产。

生命政治生产与非物质劳动在两位作者这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这种劳动的终端产品是非物质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因为相互协作的不断增强而具备了摆脱资本而自主生产的能力。这种生产不仅生产产品即客体，同时也再生产生产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主体，在其生产能力和行为直接就具有政治性的意义上，这种生产是政治性的；在其再生产生命形式的意义上，它是关涉生命的。因此，两位作者将这种生命形式命名为生命政治生产。在生命政治生产的霸权下，在资本增殖的同时，生产者的主体性也在经历价值自行增殖（self-valorization）的过程。

价值自行增殖这个概念的德语为 Selbstverwertung，出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这一价值的倍

增。^[15]在奈格里看来，与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自我强化过程，是外在于资本并且自主发展出来的生命形式和社会形式。在奈格里所属的意大利自主主义思想中，这个概念和出走（exodus）、普遍智能和制宪权等具有同等关键的意义：“价值自行增殖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个过程构成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另类和自主的集体的主体性。”^[16]正是基于这个概念，在《帝国》中两位作者写道，真正的事件只有当政治得到肯定之时才会出现，这意味着“创生的完成，主体间的协作性集合即价值自行增殖和无产阶级对生产的管理成为制宪权”^[17]。

生命政治生产与共产主义的契机

齐泽克指出：“他们（按哈特和奈格里）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帝国》仍然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8]如果说齐泽克的批判对《帝国》是有效的，那对《大同世界》就不再适用了。在这本书中，哈特和奈格里创造性地借用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提出“生命政治劳动的技术构成”概念——谁在生产、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生产，这涉及生产的主客体以及生产方式。在帝国时代，劳动形式经历了新的转变：非物质生产日益占据霸权地位；工作日益女性化；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流动劳工日益增多。其结果就是，生命政治生产将经济的中心从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生产与再生产也日益混同。^[19]于是，在生命政治中，劳动就**直接具有了政治性**，不再像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只属于必然性的领域。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劳动既关涉生命的再生产也具有政治性。

在泰勒制下——两位作者认同列宁的观念——因为工人在生产空间需要臣服并接受“监工和会计”的监管，所以他们在政治领域也需要老板即权威，这个权威就是现代的先锋党。但是在生命政治劳动的语境下，因为劳动者在生产空间能够自主地进行组织和协作，那么在政治领域他们就不再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威，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劳动为诸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治提供了历史条件。于是，就有了原书序言中的那个命题：诸众正在生成新君主。**原本的现代君主即先锋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自发和自觉的二律背反也彻底失效，因为诸众的行动既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作为新的历史主体，诸众不再需要任何灌输和引导，他们正在成为自为的阶级。

人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磨炼出的技术（技术构成）增强了他们在政治行动

领域的能力（政治构成）。正是从这个角度，两位作者看到了新的全球民主的可能，这种民主如马克思所说，“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0]。

另外，生命政治劳动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在实质上也为诸众所共享。于是，两位作者提出了如下论断：私有之于资本主义，正如公有之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正如共有之于共产主义。这个论断也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即便具有反现代性，也属于现代性筹划的一部分，于是为了避免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他们将共产主义规定为超越二者的另类现代性。

但这并不是能说共产主义就指日可待了，因为生命政治生产的自主性只是部分性的，归根结底依然处于资本的掌控之下。虽然两位作者也提到了“过渡”问题，但是究竟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经典马列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1]我们可以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在《诸众》的最后部分已然否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22]，在他们看来，在生命政治劳动的语境下，任何形式的代表和先锋队理论都不再具有合法性，诸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习得并增强他们的民主能力，从而最终实现世界大同。这是彻底的内在性政治。替换成一组对子就是**诸众内在的生命政治去对抗帝国超验的生命权力**。

另外，这里的诸众政治就不再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为主导，而是一种斯宾诺莎意义上的革命平行论：种族政治和性别政治与阶级政治是同样重要的斗争领域，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也就是说，阶级失去了其优先性，革命性的阶级斗争必须与革命性的种族斗争和性别斗争携手同行，这些斗争的革命性就体现在消灭作为身份的阶级、肤色和性别的目标中。这是与承认的政治截然相反的。前者是要创造一个无阶级的、肤色和性别对我们的生活不造成影响的社会，后者则想要完善既有的身份——改善工人的条件，让黑人更能接受他们的黑人身份等。另外，这些斗争必须平行地展开，而不能让某个斗争成为主导，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想要毕其功于一役，虽然这是漫长的战役。

抽象与现实

这种推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同时我们也承认，哈特和奈格里很好地贯

彻了马克思科学的抽象法。但在现实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一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全球的金融一垄断资本家因为货币的抽象权力更加猖獗，不稳定劳动者（precarious labor）越来越多。所谓不稳定劳动者，就是没有稳定雇佣关系、没有就业保障并且缺乏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的那些非正规劳动者。正如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指出的：“全球的非正规工人阶级（与贫民窟居民有交叉，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大约有十亿强，这让其成为地球上增长最为迅速、史无前例的社会阶级。”^[23] 斯坦丁（Guy Standing）也认为全球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属于不稳定阶级。这些人正是诸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原本的产业工厂内，生产与再生产是截然分开的；在理想型的福特制那里，则意味着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这与帝国的崛起相平行）新福特主义制度下，实行弹性的工资关系，通过工资的减少来恢复边际利润。其结果是资本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具有流动性，而劳动一方则因为去中心的分散化生产、更不稳定的就业岗位，而变得更加难以组织，这样在其与资本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势必要受到极大削弱。于是，工人的就业变得岌岌可危，他们除了在劳动场所努力工作之外，在剩余的时间内也得殚精竭虑，打临工或者再充电，自我投资人力资本，方能维持生计。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产业工厂的高墙不见了，社会成为一个大工厂，工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所谓“灵活性”，即意味着夜间工作、周末工作、不规律的劳动时间，以及所有雇主梦里都永永在念的东西。^[24] 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不再是剩余劳动，而是劳动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协作、情感、信息、图像和符号等，也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共同性。剥削的结果是劳动力所面对的两种贫困：时间的贫困和空间的贫困。前者意味着劳动者惶惶不可终日，可能从事好几份工作，随时为下一份工作而操心，对自己的生命时间完全失去控制，无法进行任何长期规划；后者意味着劳动者在大都市被边缘化和罪犯化的处境，他们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被排斥在大都市的社会空间之外。^[25]

在新福特主义的劳动体制下，不稳定劳动者变得越来越灵活，而被制造的不稳定性其根本目的是造就一个完全听命于资本的劳动力群体。因此，我们看到这种灵活性的劳动体制完全是专制性的，恩格斯化用但丁的、关于工厂的那句名言依然有效：**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26] 只是这里的工厂变成了社会工厂。

布迪厄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认识到这种不稳定性的政治内涵：不稳定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方式”，其基础是造成一种普遍而持续的不安全状态，旨在迫使劳动者屈从，接受剥削。^[27]所谓灵活性，其目的在经济上是灵活剥削（flexible exploitation）；在政治上是以客观规律的名义，在生产领域施行专制。可以说，不稳定性是资本家阶级对劳动阶级所采取的阶级斗争策略。其结果就是不稳定劳动者的组织能力以及对抗资本的能力都越来越弱。在这种情形下，政党的代表性也愈来愈弱，这也可以说是汪晖所说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这是哈特和奈格里所没有看到的。

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生产的分析及对共同性的阐发，都是基于西方后福特主义的语境。后福特社会中扁平化的管理、工人高度的技能化、生产组织内部的充分协作、弹性化的社会分工网络，都在他们的理论中得到了呈现，也让他们看到了生产民主的可能。但是后福特主义并非普遍化的生产模式，尤其在新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新自由主义进一步从欧美蔓延到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新福特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可以说，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生产模式已经不是后福特主义，而是新福特主义。哈特和奈格里囿于 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的局部经济模式，没有注意到起源于英美、后来风行于中国的新福特主义，这就让他们的理论带有先天的历史缺陷。^[28]

当然，两位作者主要偏重的是流动性和灵活性所带来的劳动者之间的普遍交往以及因为这种交往所生产出的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在面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力量时，显得非常虚弱。

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股份企业越来越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应。“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9]恩格斯正是从马克思所指出的垄断化倾向看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而后来的希法亭则认为不需要经过斗争，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就可以实现对生产的理性规划即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劳动所生产出的共同性是在发达资本主义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像希法亭那样放弃斗争，只是他们的斗争策略与正统马列主义分道扬镳了。

于是，问题又回来了。诸众到底能否在没有先锋党领导的情况下自我组织，并且跨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另外，性别斗争和种族斗争真的可以和阶级斗争等量齐观吗？（哈维同意齐泽克的观点，认为阶级有着不可否定的优先性。另外，从中国的社会